

文化品质就是国家品质

文化品质就是国家品质,文化发展关系国家发展。拥有怎样的文化生活、文化品质,不仅决定了个人的幸福指数,也影响着

“过年就是过文化”,龙年春节,各地庙会、乡村游、从乡村大集演出、自办“春晚”,到城市看电影、进书店;从短信拜年、电子贺卡,到微信传情、网购年货……刚刚过去的春节长假,着实让文化消费火了一把。

每逢春节的文化之思,也是高速发展时代中国文化焦虑的一个缩影。物质潮流席卷而来,如何坚守心灵高地?观念世界众声喧哗,如何定位价值坐标?文化产品五光十色,如何汲取精神营养?

这样看似宏大的命题,其答案不断在我们身边闪现。热心慈善公益的“心灵富翁”多了起来,却也不乏“开着宝马住保障房”之辈,呈现出醒目的价值观分野;“最美中国人”频频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但“扶老难题”也迟滞了一些人行善的脚步,诉说着复杂的道德困境;在众多城市奇迹崛起的

恩格斯说过: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有品质的文化,才能成为进步的基点;成色不足、品质低劣的文化,却往往是心灵的枷锁、进步的桎梏。一些人把过春节简化为送礼喝酒、麻将牌九,甚至“把清明节以外的所有节日都过成情人节”,消费狂欢掏空了文化内涵;一些地方热衷于“名人故里”之争,大搞有名无实的节庆会展,大建华而不实的仿古建筑,功利思维制造了一个个文化空壳;一些媒体以暴力、色情、低俗吸引眼球,一些影视作品靠复制翻拍、穿越恶搞博取票房,一些青年人在网上晒名包炫豪车作为人生价值标签,精神贫乏、价值空心、信仰荒芜,屡屡成为刺痛社会的文化病灶。

“品质为王”,这是文化发展的不二法门,也是中国

文化向上突破的瓶颈所在。当人们纳闷为什么中国的花木兰、大熊猫成了迪斯尼的摇钱树,更应想想这种“洋拿来主义”所依托的创意设计力量;当人们惊叹苹果专卖店门前的“果粉”排队队长,更应思考是怎样的魔力“把公众熟知的产品转变成一个企业文化的象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文化软实力,谁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一位美国教授对“汉语热”的看法值得深思:美国曾刮起一股“日语热”,但很快就消失了。如果汉语背后没有文化,文化背后没有思想,思想背后没有精神,这个神话也难免会消失。

这一切无不揭示一个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问题:文化品质就是国家品质,文化发展关系国家发展。正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所强调的,“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

“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在建设文化强国的道路上,如何提升文化品质,是13亿中国人的共同考题。作家怎样书写“民族心灵史”,导演如何奉献“诚意之作”,企业怎么诠释“卖产品不如卖品牌,卖品牌不如卖文化”,各地能否走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执政党如何建设“学习型政党”,对这些问题能否不断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检验着一个民族“发展起来以后的文化自觉”。 任文

韩寒与方舟子的论战应该留下什么?

“打假斗士”方舟子这次将矛头指向了80后代表人物韩寒。在经过几天隔空“骂战”之后,29日,韩寒委托律师,就方舟子通过互联网“质疑韩寒代笔”其间造谣、对韩寒名誉造成损害事宜,在上海提起法律诉讼。(中国经济网)

对于韩寒来说,当自己说的话已经无法让对方接受和相信,而对对方的发言又会影响到自己的声誉时,他需要一个权威的机构来给自己一个说法。而对于方舟子来说,通过这个过程,他的质疑可以得到更多阐释机会。换句话说,两个人可以在法律的层面上展开更充分的博弈——这个博弈的结果可以指向事实和真相。

同时,还有两个问题是可以在此次起诉中得以深入和厘清的。首先,就是公共讨论的界限在哪里?任何公共话题都可能涉及具体人的形象和声誉,但因为是公共话题又关系到公众的利益,因此必须有人发言、质疑、讨论。此时,公共讨论的界限在哪里?何种发言是可以接受的,而何种发言可能引起负面影响?如果我们明白事实是发言的依据,而客观是理性的表现,则应该明白,公开发言需要秉持两个最基本的原则:确凿的事实;无偏见的意见。只有事实确凿,才能保证发言不沦为妄言,只有保证意见出于公共立场,才能保证观点不会偏颇。这两点无疑是任何公共话题讨论都应该坚守的。

其次,就是围观公共讨论的态度应该怎样?公共讨论不是个别人的事,虽然论战的主力可能只是个别意见领袖和当事人。在公开的公共讨论中,公众不仅是外部的围观者,他们还是事件的参与者,他们的态度直接影响着讨论的质量,影响着论战各方的情绪。如果,公众在围观公共讨论时过于情绪化,则浮躁的舆论只会让公共讨论流于表面——虽然大家都在关注,但关注的重点不是事实的真相,而是事情的热闹程度与个人内心的“成见”。只有以冷静和理性的态度围观公共讨论,才能制造出一种旨在厘清真相的氛围,才能让公共讨论的各方保持心平气和的心理。此时,这种冷静和理性就可以成为一种正向的参与力量,促使事情顺着应有的规律正常发展。厘清了这两个问题,人们在对待类似的案例时,才会有明确的参与态度和方法。这才是韩寒与方舟子论战应该留下的。 乾羽

别让年味儿的“魂”溜走

从北方看冰灯、逛庙会,到南方逛花市、乡村游;从乡村大集演出、自办“春晚”,到城市看电影、进书店;从短信拜年、电子贺卡,到微信传情、网购年货……刚刚过去的春节长假,着实让文化消费火了一把。商务部1月28日发布的监测报告也证实:2012年春节,休闲娱乐文化消费渐成主流。

中国的年文化,正在回归春节的文化本位。这是一个值得欣喜的现象。不过,“消费主流”的同时,也听到另一种“感叹”——“年味儿越来越淡了”。为什么日渐红火的春节文化消费市场,仍然驱不散人们对年味儿远去的担忧?

这背后,折射的其实是一种文化焦虑:年文化的“体”五彩纷呈,年文化的“魂”是否安好?特别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节日节不断冲击,人们的生活方式趋同,怎样过年才算有“年味儿”?

不同的人对“年味儿”有不同理解,也不断变化。今年春节,北京清东陵举行一场“穿越”庙会,试图“完

整再现原汁原味的大清文化”,里面混杂着“穿越版”的阿凡达、机器猫,有人认为是创新,很喜欢;有人则觉得是亵渎,很反感。又如,没有鞭炮喧天的春节,算不算有年味儿?有的城市先“燃放”,后顺应民意解禁。如今,随着环保意识增强,特别是PM2.5的触动,一些人再次提出“燃放”……

春节是万家团圆的日子,个体选择怎么过本无可厚非,但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不让年文化的“魂”溜走,是必须正视和解决的文化命题。因为,每一个春节,都包含着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丰富故事,交织着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复杂内涵,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镜像。

“草木枯荣分四时,一岁月有十二圆。”春节根植于中国农耕文明的时序观,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节日。重人伦与重仪式是其核心。“人伦”联系着亲情友情,勾连着代际关系,所以,人们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只为和家人朋友吃顿团圆饭;“仪式”则购置着集

体记忆,培养着神圣感、凝聚力,所以,扫尘、写春联、包饺子、守岁、祭祀祈福,强化的是一个家庭、一个民族的集体文化记忆。

许多人之所以感觉年味儿越来越淡,恰恰缘于春节的情感性与仪式感在弱化。有中学生这样写道,“春节,就是你家亲戚喊你去吃饭。可我是独生子女,亲戚很少,见了面也没什么话说。”网上流传“中国年轻人最讨厌的长辈春节问候语”,诸如“期末考试怎么样?”“你什么时候结婚?”让长辈们很是尴尬。与此同时,新的文化娱乐方式的兴起,也冲击着春节的传统仪式感。

应该承认,这些“冲击”是必然。但反过来也提醒我们:要想留住年味儿的“魂”,恐怕既需要增进代际沟通,让情感的力量更获得认同感,也需要使节日的仪式感更具吸引力和传播力,成为不断凝聚家族民族的纽带。

这不仅需要我们的文化生产与传播更好地担负起责任,也需要我们每个人读懂“春节”的文化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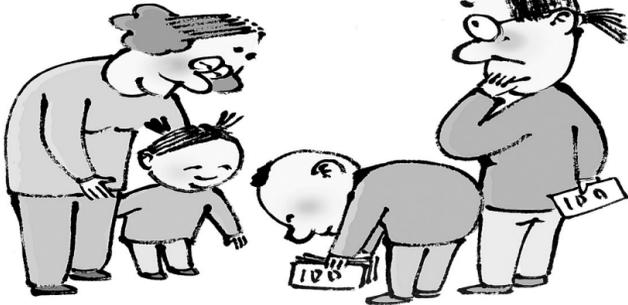
绍刚

网友叹派压岁钱HOLD不住

春节期间,给压岁钱成了必不可少的事。现在随着物价和生活水准的提高,给孩子的压岁钱也水涨船高,可现在的问题是,还像以前那样给100或者200元,觉得拿不出手,给500元甚至更多,面子是有了,里子却伤了。

压岁钱,给少了没面子,给多了压力大。过春节,给孩子们压岁钱是传统新年的必行之事。周围有人表示,随着物价、生活水平的提高,给孩子的压岁钱也水涨船高,500元成为最低底线。按照这个标准,光这一项就要送出4500元,真是HOLD不住啊!

王锋绘



批判的缺失,小品的衰落

2012年央视春晚语言类节目仅为7个,与鼎盛时期的16个相比少了一半还多。1月28日,央视春晚总导演哈文表示,语言类节目的衰落是小品缺乏市场的推动。(1月29日《北京晨报》)

小品为什么没有市场?是没人看了。可我们进一步追问,小品为什么没人看呢?不好看。为什么不好看呢?或许这才是我们思考的关键之所在。

其实,各种名目的文艺演出,似乎都缺少了喜剧的参与。然而,近些年,小品这种喜剧表演在给观众带来笑声的同时,因喜剧审美批判精神的稀释与退化,原本应该作为喜剧灵魂的讽刺已存在很大程度上被无意义的噱头、无厘头的搞笑所代替。

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有些受到

主流媒体推崇因而风靡一时的所谓重点作品,却把艺术表现的重点片面地放在票房价值的追求上,喜剧艺术的美学价值在某些小品中已经荡然无存。于是,媚俗之风在喜剧舞台上开始蔓延,庸俗、浅薄取代了理趣的生动和意蕴的深刻,那些背离了喜剧美学基本精神的庸俗之作,却在一些人的无原则的吹捧中像充满气的氢气球,以飘飘然的态度漫天飞舞。

喜剧小品的艺术,是坚持把鞭挞丑陋作为自己的灵魂,通过讽刺去实现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目的。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喜剧是对于比较坏的人的模仿。然而,‘坏’不是指一切恶而言,而是指丑而言,其中一种是滑稽。滑稽的事物是某种错误或丑陋,不致引起痛苦或伤害。”

所以说,缺乏审美批判精神的喜

剧带给人们的笑声并不是喜剧的笑,而只能是停留在生理反应层面上的笑。浅薄庸俗的噱头,奇形怪状的体态,虽然可以成为笑料,但是难于显示人物性格而且缺乏社会意义,因此不能构成真正的喜剧。这种缺乏批判精神的所谓喜剧,它们徒有喜剧的外表,却没有喜剧的美学内涵,那是一种“假喜剧”。

小品可以建立在俗文艺上,但好的作品是不会满足于低俗,他们会超越低俗,拯救低俗。可当喜剧小品缺少丑角的文化批判,谈拯救低俗是虚妄的。这对于小品的受众来说,尽管需要一种贴近自己的俗文艺,但绝非意味着可以容忍“无聊”与无厘头走进生活。当人们所拒绝的成了不得不接受的,自然这样的小品不会被人所喜爱,也就没了市场。 想斌

谁为龙江河镉污染事件负责

对这样一个重大的、跨地域污染事件,不能仅仅追究排污企业的责任,还应厘清是否存在瞒报、渎职等情形,同时建立跨流域防污、治污的常态化机制。

据报道,广西龙江河镉污染事件形势仍不容乐观。在河池为消除镉污染所设置的5道防线中,目前龙江河上的最大镉污染团即将突破第3道防线。在柳州市区上游57公里的柳城县糯米滩水电站以上的龙江河段,目前有镉浓度超标5倍以上的水体长达100公里。据最新报道,广西已刑拘涉嫌违法排污的相关企业的8名责任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龙江河镉污染情况还在不断发展变化。当地政府也在不停地发布消息,强调城市供水不会有问题,但现在人们更为担心的不仅是镉污染事故本身,更是当地政府在此事处理过程中措施是否得力,谁该为持续了十几天的龙江河镉污染事件负责? 现在广西当地对镉污染不可谓不

重视,自治区政府有关负责人甚至表示,动用“哪怕全世界的力量都要想方设法……一定要做到保障没有问题”。

但是,相比这种承诺,人们显然更愿意看到透明、有效的处置行动。换句话说,在“动用全世界的力量”之前,当地政府是否已经用尽自己全部的力量,是否已经尽到了应有的责任?

1月18日柳州市接到河池市通报,启动饮用水水源污染事故应急预案Ⅲ级响应。到了1月27日,广西启动突发环境事件Ⅱ级应急响应。但媒体报道,龙江河死鱼事件1月15日已经发生,直到十多天之后,广西才启动全面的应急响应机制,这中间的迟滞原因是什么?如果能早一点启动,污染是否能早一些得到控制?

此外,污染事故发生后,河池市应急处中中心透露,污染源已初步查明,来自广西金河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但三天之后,该处置中心又称,由于岩溶地貌等多方面原因,污染源的最后确定遇到不少难题,污染源仍

需进一步排查、确定。而据最新的消息,广西已刑拘涉嫌违法排污的金城江鸿泉立德粉材料厂等相关企业的7名相关责任人。那这些企业究竟是如何造成大面积污染的,相关部门在日常监管中为何没能及时发现,监管机制是否存在漏洞,还需进一步查实处理。

该事件发出的另一重要警示是,要突出河流污染治理的“流域意识”:上游有问题,下游必须早做防范。一旦发生污染,上游责任部门必须及时通报相关信息,而下游则宁可把问题想得严重一些,也不能迟滞怠慢,做好跨区域的协同作战。否则,上游解决了,问题就会推给下游。

对这样一个重大的、跨地域污染事件,显然不能仅仅追究排污企业的责任人。在全力治污的同时,有关部门还应继续调查,清查是否存在瞒报、渎职等情形,对相关负责人及时依法追责,同时建立跨流域防污、治污的常态化机制,如此才能让当地民众真正心安。 静静

尽管海南三亚海鲜排档“宰客”事件,因当事人“隐身”至今难以取证,真相有些扑朔迷离,但此事显然对三亚旅游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三亚市旅游记委表示,2月1日就“宰客”现象向大家表示歉意,同时表示,对旅游行业出现的“害群之马”实行“零容忍”,一经查实,绝不姑息。

从2010年重庆王女士等人一顿饭被索3万元,到不久前黑心店用含水泥类层的纸箱包装水果;从旅行者的亲身体验,到网友们的大倒苦水,近年来,海南三亚旅游环境屡遭质疑。按说,商贩正当经营,合理盈利,凭借独具特色的天涯宝地,不是不可以赚钱,为什么偏要“宰”客?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旅行者大多是一次性消费。不留回头客的心态与必不可少的花销,给疯狂宰客者创造了条件。正如一位网友所说,三亚出租车没有机打发票,如果不记下车牌,不录音拍照,“挨宰”后难以取证。

处理力度小,监管不到位,导致一些商贩心存侥幸。当地政府三令五申,节前有“军令状”,有倡议书;节中有“一次性死亡”、“信用分类监管”制度,有综合执法队、固定执法岗,然而歪风难刹,欺客仍行。原因在于:宰得多,罚得少,我还赚,逮不着,更划算。一旦出现问题,取证难、执行难,商户与执法人玩起“躲猫猫”。

其实,游客纷至,宰客不绝,并非三亚一地。云南省一寺庙年承包费720万元,游客被强捐2万多元功德钱。种种怪象,不禁让人想起“公地悲剧”的故事:当草地向牧民完全开放,每个牧民都想多养牛。如果所有人都这么做,草地将被过度放牧,牛终被饿死。旅游景区拥有独特的“公地”资源。如果人们把美景演变成“诱饵”,最终伤害的是自己的利益。

就海南而言,国际旅游岛建设成为国家战略已有两年。从政策优惠、项目落地到赛会频频,乘着国家战略的东风,普通民众享受到更多优惠,也遭到“成长的烦恼”。为生计考虑,不少人加入旅游从业大军。由于观念没有跟上,管理没有到位,一旦出现“开门迎客,关门宰人”现象,虽获一时之利,却给旅游业的长远发展埋下隐患。

亚里士多德曾言:“那由最大人数所共有的事物,却只得到最少的照顾。”作为绿色朝阳产业,旅游业已成为越来越多地方的经济支柱。对海南而言,尤其应该珍惜大自然的恩赐,用好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令人欣喜的是,三亚市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加大对拒绝履行合同、恶意欺诈等行为的惩罚力度。我们期待,包括三亚在内的所有旅游胜地,都能警惕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的危害,更多考虑如何提供与国际接轨的高水平服务,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 跃峰

记者日前获悉,今年最高检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社会管理权力实施的贪污贿赂案件将进行严查,并且将着重增加社情民意收集,充分了解民生民情,加大对案情犯罪信息的侦查,特别要重视网络舆情,提高发现犯罪的能力。(《京华时报》)

毋庸置疑,导致出现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监督不足。现有的反腐制度主要是通过纪检监察机关对权力进行监督,然而面对日益复杂、多样的腐败手段,仅仅通过体制内的力量进行监督,能起到的效果肯定是有限的。现有的反腐机制未能充分起到遏制腐败的作用,这说明,一方面,现有的预防和惩治腐败制度还需要不断完善;另一方面,还需要探索新的途径,建立完善多层次、立体的反腐机制。“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充分发挥民意监督权力、打击腐败的作用,理当成为反腐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数事实证明,民意监督在反腐历史中是很有效也很关键的监督形式,如天价烟局长、香艳日监局局长等——民意监督是一种非权力型的监督,具有公开性和广泛性,能给被监督者造成威慑,并引起社会公众的重视,有利于职能部门顺势依法介入,预防、打击腐败。曾有学者总结:民意监督的威力容易实现最大化,通常具有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典范作用;监督面最广,不受地域、行业、领域限制;干预最为迅速,网络、媒体等可在数小时到数日内产生监督效果,这是其他监督形式无法比拟的。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欢迎民意监督权力的,更不是所有的地方都会主动创造条件让民意进行监督。事实上,在一些地方,涉及监督的新闻发不出来、帖子被屏蔽、网民被通缉等现象时有发生,正因为这些阻力的客观存在,不少“民意”对于身边的腐败现象往往呈现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态。这提醒我们,各级地方政府有必要进一步深刻认识到,“当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消除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只有人人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负起责任,才不会人亡政息。”

总之,各级政府应越来越看重民意监督的作用,有必要出台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完善民意监督机制;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政府要不断增强自身透明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民意有处监督,进而使民意成为政府工作的指引,真正打造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廉洁型政府。 昌发

旅游景区要走出“公地怪圈”

民意监督理当成为反腐的重要力量